



《人口结构危机是什么?》专题报道之七

我们是否误读了马寅初?

■ 李建新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为马寅初老先生人口论平反以来,一直就存在着对马老那个时代人口数量激增以及马老人口观的误读误解,比如当年媒体对马老平反概括最流行的一句“错批一人,多增三亿”;再比如,把马老的人口观与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论等同起来。

进入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走向现代化道路,人口也随之开始发生转变。在20世纪50年代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人口转变初期,世界人口死亡率为20‰左右,到70年代以后下降到了10‰,也因此世界人口经历了人类人口史上两个人口爆炸顶点,第一个是人口增长率顶点;第二个是世界人口年增长量顶点。世界人口也由1950年的25亿增加到了2000年的60亿多,进入了人类人口史上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到21世纪,世界人口增速明显放缓,2050年世界人口预计超过90亿。未来世界人口还将出现第三个顶点,即世界人口数量规模的顶点,这个顶点预测将在2200年左右到来,届时世界人口将破纪录地达到100亿左右。

人口转变带来世界人口数量规模迅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如果说,20世纪后半叶50年世界人口变迁突

出表现为人口数量爆炸上,那么21世纪上半叶的50年里,世界人口变迁将主要表现在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上。

1950年世界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仅为5.2%,2000年为6.9%。根据联合国人口预测,2050年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16.2%。前50年老年人口的比例增长了33%,后50年将增长135%,大大超过了前50年的增长变化速度。人口转变中人口年龄结构的其他指标如少年儿童人口比例、劳动力人口比例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以少年儿童人口比例变化为例,1950年0至14岁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为34.2%,2000年为30.2%,2050年下降至19.8%。人口年龄结构剧烈的变化也将首次打破人类人口史上传统的人口金字塔结构即底部大而上部小,形成人口的“倒金字塔”型。上述人口数量和结构的极大变化皆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而人口转变又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我国人口转变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我国开启了和平时期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同时人口也开始发生转变,我国人口转变是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人口转变的一部分。20世纪50年代,不含中国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死亡率分别为

44.6‰和23.4‰,同期我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分别为43.8‰和25.1‰,可以看出我国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中的一员,人口同处在于高出生、高死亡的水平上。

到了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死亡率分别降至41.1‰和16.5‰,人口增长率也迎来最高峰,由人口转变起点的2.12%升至2.44%,形成了世界人口爆炸。同期,我国出生率、死亡率双双降至36.9‰和10.9‰,人口增长率也迎来了最高峰,由人口转变起始的1.87%冲高到2.61%。事实上,战后整个发展中国家由于现代化的后发优势,其人口转变初期的死亡率下降速度较之于发达国家的要快许多。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国死亡率下降速度更是惊人,这是建国之后社会和平发展的必然结果,特别是“土改制度”和“赤脚医生”制度迅速建立和普及的结果。中国的经验还曾一度为世界卫生组织所推广。所以,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激增是人口转变中死亡率迅速下降的结果,而绝不是“错批一人”的结果。

实际上,正如一些学者的研究指出,当年对马寅初先生的批判只停留在人口理论层面,在真正影响人们生育行为的政策层面上,建国以后是不存在直接鼓

励生育的，相反，国家一直是倡导节育的，从50年代到60年代我国生育水平也是逐步下降的。正是有了五六十年代的节育政策的宣传准备，才有了70年代“晚、稀、少”政策如此巨大的成效。把我国现代化过程中人口转变必然带来的人口数量激增归为“错批一人”，完全背离了社会发展和人口自身再生产变化规律。

如何看待人口对经济发展影响？在这点上我们同样存在着对马老《新人口论》的误读。要说马寅初老先生的《新人口论》，必会提到马尔萨斯《人口原理》。马尔萨斯发表其人口论著时是处在英国工业革命的18世纪末期，马寅初则是处在新中国诞生的20世纪中叶，但他们都是处在本国人口转变的初级阶段，他们都观察到了相同的人口问题。所以，从一定的意义上讲，马寅初所讲的人口问题与马尔萨斯所言的人口问题有相似之处，都是人口转变初期人口数量过快增长和生存资料增长相对较慢而产生的比例关系失衡问题。所不同的是马寅初揭示的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口转变初期的各种矛盾。

从18世纪开始的西方工业革命、现代化，至今还在世界各国一波又一波的“上演”，而各国先后开启的现代化又必然带动了人口转变。在20世纪后半叶以后，近80%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先后加入了这个行列。我们看到，在各国人口转变初期，由于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必然出现人口高速增长，因此都必然存在着马氏所揭示的人口过快增长与生存资料增长不相平衡的矛盾。从这点出发，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人们总会说，马尔萨斯的“幽魂不散”，因为马尔萨斯所论述的关系失衡现象必然会在各国人口转变初期重现，这可以说是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转变规律所致。

马寅初在1958年发表《新人

口论》中所论述的问题，正是我国人口转变初期的人口问题，这些问题皆与人口数量增长过快有关：如人口快速增长与资金积累、与粮食增产、与教育事业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对较慢的矛盾关系，而这些矛盾关系的主要方面是我国人口转变之初人口增速过快。所以马寅初《新人口论》的观点核心不是人口数量多带来的问题，而是人口变化过快带来的问题。遗憾的是至今人们都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都以为马老是在强调人口数量太多了，把马老与控制减少人口数量等同起来，这是对马寅初老先生人口观的极大误读！

当今不少主张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学者还常常搬出“马寅初”来证明自己“一胎化”主张的正确性！在这些人看来，中国的人口问题始终还是人口数量过多的问题，并以“分母效应”为分析手段，以减少人口数量可提高人均GDP、可减小资源环境压力的荒谬逻辑来论证人口政策未来走向。例如，在讨论未来劳动力人口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时，他们主张继续实施严格计划生育并断言不会导致未来劳动力人口“短缺”，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根据联合国人口预测，我国2050年，即使继续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1.2，相当于一孩政策），劳动力人口总量仍为7.4亿，比2000年8.6亿少1.2亿。他们这样推理到，现在尚且存在着就业难，存在着“人口过剩”，将来现代化程度更高，更不需要那么庞大的劳动力，因此我国未来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

这样的观点听起来挺有道理，但是以动态结构观去分析人口变化，却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静态比较的问题。先来看看人口结构的变化，2000年的8.6亿劳动力负担的65岁老年人口仅10%

（即老年抚养比），而2050年的劳动力人口抚养系数将上升至45%，即由现在10个劳动力人养一个老年人变为两个多劳动力人养一个老年人，仅仅对比劳动力人口的绝对数量是反映不出这些结构问题的。

同样，进一步分析表明，我国劳动力人口数量规模将在2015年左右达到近10亿规模，其后劳动力规模将加速递减，特别是2030年至2050年，劳动力人口将由9.4亿锐减到2050年的7.4亿，平均每年减少一千万（减少的都是年轻劳动力，劳动力人口内部结构老化）。与此同时，老年人口以平均每年一千万速度增加，这样一个剧烈的动态的老化过程将会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将对我国综合国力实力维持带来多大的冲击？主张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学者是无法回答这些挑战的。

实际上，今日主张放开生育政策与马老人口论在本质上有相同之处，都是主张要避免人口变化过快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马寅初时代人口变化过快表现为人口数量快速增长，所以马老主张控制人口数量增长；而现在人口变化过快表现为人口结构急剧失衡，所以主张放开生育政策调节人口结构平衡，人口数量和结构是人口变化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今日中国人口问题已经不再是人口数量过快增长的问题，而是人口结构急剧变化导致的各种关系失衡的问题，这是一些更宽泛更复杂的人口问题。这些问题首先皆与人口自身结构失衡如急剧老龄化、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等有关。而这一切又与现行的生育政策直接有关，继续收紧政策的主张将会使我国人口问题“雪上加霜”。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人口学家）

责任编辑：李 冀